

環境開發模式與綠色發展概念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Model and the Idea of Green Development

魏光莒*

摘要

本文首先探討現代社會的「發展模式」對環境的開發，為什麼是有嚴重盲點的。尤其，它系統性的忽略了環境中的「生物性限制」。現代發展模式，一味追求快速、方便與龐大經濟效益，因此而盲目的自我擴張與過度的消費，終究造成自然生態的破壞。這也反映出了現代的知識體系是有不足之處的，它無法面對一個自然資源受限制的世界及「地球生物圈」正在退化的一個生態秩序。而中土傳統的風水學則反是。風水，正是代表了古代人嘗試去掌握自然界中「深層生態秩序」的努力。其基本態度，是現代社會值得參考的一種「綠色發展」概念。

關鍵字：發展模式、生物性限制、現代的知識體系、深層生態秩序
綠色發展

* 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副教授。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modern techn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environment is problematic in quite a few aspects. Especially modern technology systematically ignored the “biological limitations” of our environment. This reflects the modern “knowledge paradigm” is insufficient to face a new world, a world that natural resources are becoming scarce. On the other hand, Feng-Shui is an ancient Chinese learning that attempted to probe into the essential order that lies within our natural environment. Its attitude towards Nature and its idea of a human development in harmony with Nature reflect a value that modern society needs today.

**Keywords: mode of development, biological limitations,
modern knowledge system, deep ecological orders,
green development**

一、環境開發模式：現代與傳統

台灣北宜公路的開闢，雖然便利了台北-宜蘭間的交通，但是其中「雪山隧道」挖掘，卻造成了一些計畫之外的狀況。在挖掘「雪山隧道」的過程，曾經遇到山巒中的泉脈被挖斷，泉水狂洩不止之情形，也曾因此而中斷了開隧道的工程許久。最後，在工程上雖是克服了泉水的問題，「雪山隧道」總算完工。但是，近日又發覺有更嚴重的負面效應產生：原本，泉水豐沛的宜蘭平原耕地，現在開始產生了耕地乾涸的問題。許多農地被迫放棄耕作，農民苦不堪言，卻又不知如何解決此問題，或向誰求償。幾百年以來，這是漢人在宜蘭地區開墾經驗中，所不曾見到的狀況。

這件事情，讓人聯想到：大台北地區的另一項重大公共工程，「基隆河截彎取直」。這件大工程完工之後，雖然多出了一些都市腹地，卻使得大台北地區的水文大亂。原本，在歷史紀錄上，從不曾淹水的「汐止」(故而得名)，卻開始每逢大雨即淹水成災。因此，政府又必須花上百億工程費，建造了「員山子分洪道」，以解決新出現的水患問題。但是這種作法，卻只是花了大錢，打造出一個新的防災避難的「超大工程」而已。大台北地區，原本自然天成的山川水文格局，已然被轉化成為某種必須「防堵」、「整治」的惡山惡水狀態。

這兩件工程案，只是比較受矚目的案例而已。同樣大大小小的環境開發案件，遍佈台灣各地方，卻從未受到過嚴正的檢討。確實，值得深思的是：現代社會中，這種對環境開發的方法，即所謂的「現代開發模式」，到底是否有盲點？不然，為什麼總有奇特的「意外」？總是無法預見重大後續問題之出現？是否「現代開發模式」，考慮不夠周全？它是否考慮了人口問題、經濟發展問題、交通便利問題，卻獨獨缺少考慮自然界的「生態系統」問題？是否，在自然界之中，是否有一種深層的「生態秩序」，是現代工程師、學者、專家們所不了解的？是否，有一種深層的「生態秩序」，是「現代知識體系」所無法懂得的？

相對於「現代知識體系」、「現代開發模式」對待大自然的這種愚昧態度，我們不僅懷念起傳統社會的「環境開發模式」了。以中土傳統而言，其環境開發的知識體系，即是所謂的「堪輿學」、或簡稱「風水」。風水，雖一度被蒙上濃厚的神秘色彩，但是其實說穿了，就只是一種嘗試掌握「深層生態秩序」(包括，大自然中山川水文的基本走向、運作方式與規律)的

一門古老學問。這門古老學問，照其基本概念而言，尤其在現代文明過度發展的今日看起來，反而是相當前衛與先進的。

其實，「現代開發模式」所影響、所涵蓋的環境範圍，不僅包括人口密集「都會區域」的部分，其實更涵括地方上「鄉間農村聚落」的廣大區域。而以台灣的農地耕種方式來看，即可發覺「現代開發模式」與「傳統開發模式」對待大自然的態度、對待土地的方式，甚不相同。讓我們舉一實例來說明：「台灣高速鐵路」新建的高架鐵路軌道，近日在雲林縣內的路段即將完工，卻遭遇到一個真實狀況。原來，高架鐵路所經過的一些農業區，其耕作方式是以「抽地下水」來進行農田灌溉，因此多年來地層持續下陷。預計 20 年後，高架軌道附近的地層，至少會下降 15 至 20 公分。而這個下降的高差，則將造成高架鐵路軌道的扭曲變形，成為一種可預見的公共危險。因此，「台灣高速鐵路」與交通部當局，即請雲林縣政府明令禁止附近農地抽地下水。對此，當地農民則怨聲載道，竟不知如何繼續耕作了。這件事情暴露出了：「地層下陷」的情況，對台灣而言，是一種真實而有立即危險的事情。

這個問題到底有多嚴重呢？根據行政院「水資源局」的數據：在民國六十四年時，雲林縣地面層平均高度，原是海拔 +2.99 公尺。而到了今日民國九十五年，雲林縣地面層平均高度，竟是海拔 -0.25 公尺。地面層的海拔高度，總共下降了 3.24 公尺，竟然已經陷到了比海平面還要低的狀況！而全縣總計共 29000 餘平方公里的面積，其中至少有 1/4 的面積都嚴重下降了（根據《中國時報》地方版報導〔雲嘉地區〕，民國 95 年 5 月 2 日）。而這是農民開始變更耕作方式、學會用「機器馬達」抽地下水，僅僅 30 年的「成果」！台灣最精華的耕地區域，即雲嘉平原的廣大農地，誰會想到竟然像今日如此不堪？而台灣傳統的農田灌溉方式，即用「溝圳系統」導引農地附近主要溪流之水來灌溉，在台灣已行之有兩三百年之久。最著名的包括彰化平原的「八堡圳」、嘉南平原的「嘉南大圳」等等，卻從未造成土地如此嚴重的長久傷害。「現代化」的耕作方式，雖然帶來了強大、快速的「機器馬達」，但是卻忽略了更深層的自然生態規律，它真的要比「傳統開發模式」還要好嗎？我們在經過這些慘痛的代價之後，才終於發覺：在「現代開發模式」的架構下，就連「農業耕種」竟然也是對土地的一種重大戕害。「現代開發模式」不論是在人口密集的都會區域，或運用在鄉村農業方面的發展，它都交出了一份可怕的「成績單」。

二、 文明的發展與「生物性限制」

現代文明的環境開發，最嚴重的盲點，就是忽略了環境中的「生物性限制」。現代發展模式，一味追求快速、方便與龐大經濟效益，因此而盲目的自我擴張與過度的消費，終究造成自然生態的破壞。這也證明了：地球上「生物性的構成」，一直是被系統性地忽略了，所以才造成系統性的被破壞，最後反而限制了人類社會的繼續發展。我們試以案例說明之。

學者保羅·霍肯（Paul Hawken）等人在其名著《綠色資本主義》一書之中，舉過一個很好的案例，來說明現代經濟體系的謬誤：當菲律賓的漁夫往珊瑚礁擲出一束炸彈，他將炸得昏死了的魚，捕獲出售給當地市場，並將珊瑚碎片賣給製藥廠。在這個時候，此漁夫是按照現代社會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獲得了一筆真實的收入。而且，這一筆收入，也將計算為現代經濟行為上的一筆「淨收入」。然而，問題出現了：此珊瑚礁，作為某些魚群的滋生棲息地，卻遭到了永遠的破壞。但是，並沒有任何人或任何機構，來支付「珊瑚礁」的損失。因此，「珊瑚礁的損失」，雖遠大於漁夫所得到的那筆金錢收入，卻沒有被計入「損失淨值」。所以，按照資本主義的「會計原則」，或按照現代社會的「市場機制」而言，這位菲律賓漁夫的行為，皆是被記為「淨收益」，而非「淨損失」。（註1）

這一個「珊瑚礁事件」，到底呈現出「現代經濟體系」的什麼盲點？值得我們深思！現代社會的「市場機制」，與資本主義的會計原則，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自然界裡「生物性的構成」（即構成生物圈內的各種「生命系統」），會被現代社會的「會計原則」持續性的忽略，會被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不經意的掠奪與破壞？而更重要的是，「珊瑚礁事件」是否只是一個遙遠的寓言呢？

假如，我們以近身的案例作一番檢驗：台灣石化工業的大基地，位於雲林縣麥寮海邊的「六輕計畫」工業園區，是不是也是如此呢？若按照資本主義的「會計原則」，或按照現代社會的「市場機制」而言，「六輕計畫」的創建與營運，皆是被記為「淨收益」的。按照「六輕計畫」的官方統計數據，它用「填海造陸」的方式，已為國家增加了 2000 餘公頃的面積；它並稱每年約有六千億新台幣的收益。（註2）這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淨收益」數字了。但是，我們所不斷忽略的，即這些官方統計數據從來沒有計入的，則是「六輕」週邊陸地的地層下陷問題，與週邊原來農漁業用地

的工業汙化，到底讓我國土地損失了多少有效使用面積？官方統計數據從來沒有計入的是，「六輕」對週邊近海海水的工業汙化，造成多少魚類棲息地的消失，多少海洋生態環境的轉變？它使得我國西岸漁業所受到的永久損失，這到底是多少「淨損失」？尤其，台灣原本擁有人間至美的亞熱帶海岸景觀，但我們西岸精華地帶的沿海觀光自然資源，現在卻遭到了永久之破壞，限制了未來子子孫孫的可能機會，這到底又是多少「淨損失」？

經濟學家赫曼·戴利 (Herman Daly) 即認為，「現代社會」把經濟過程看成是「生產」與「消費」這兩者之間的封閉性價值循環，這其實是一種「脫離現實」的經濟概念。這種經濟理論，只是建立在很表面化的、只以「人的目的」為中心的「思考邏輯」之上。(註3) 實際上，經濟行為並非是封閉性的「生產」與「消費」關係而已。自然界裡「生物性的構成」(即構成生物圈內的各種「生命系統」) 這麼重要的一項價值體系，怎麼可以被忽略掉了呢？所以，一旦我們經過深刻思考與推論之後，我們對「現代社會的發展」，不僅開始感到有些恐怖及憂心：現代社會，是不是活在一種「虛幻的富裕」之中，及「幸福的假象」之中呢？很明顯的，雖然現代人非常自豪於所謂的「經濟成長」，但那些被大量砍伐的森林、迅速消失的雨林、大量流入河流的有毒物質，二氧化碳排放過量造成的「地球溫室效應」，貧瘠的第三世界農村與聚落、被邊緣化的各地本土文化、被剝奪了傳統價值的眾多人民等等，卻都沒有被視為「生產要素」，都沒有一併被列入「成本計算」之中。因此，現代社會這種實踐模式，當然會造成自然生態的危機。地球上「生物性的構成」，已經被這個「發展模式」系統性地掠奪及嚴重地破壞了。最後，可以想見：人類社會的現況，已經使得自然界的「生命系統」面臨了真實而巨大的威脅。(註4)

美國知名生物多樣性研究專家彼得·雷文 (Peter Raven)，就曾撰文指出：地球的生態系統，對人類所提供的「綠色服務」，其功能已經產生了「根本問題」。換而言之，現代社會的擴張模式，建立在一系列工業化發展的進度上，已經嚴重影響地球的生態機能。「我們正在破壞這種生態功能，並已達到難以置信的程度。」生物圈的系統，包括「來自太陽的能源流動，所有光合作用生物體的活動，調節地球上儲備能量流轉的食物鍊及群落」等，但是人類社會的發展，「正在打破這個這個流動過程，或正使這個過程偏離軌道。」(註5) 是的，人類社會的「現代發展模式」，造成了過度消費、過度浪費資源的生活方式，並在生產方式上，持續掠奪自然資

源與毒害環境。許多的科學數據，已經給了我們嚴重的警訊：地球上「生物圈」的退化，正以加速度的方式發生著。而地球的人口，則是以加速度的方式在膨脹著。因此，如果我們不作出根本性的改變，人類的命運大概就真的堪慮了。

由此而觀之，限制「現代社會」的持續生存與經濟發展，限制人類社會「現代發展模式」的，正是自然界的「生命系統」自身。美國「洛磯山研究中心」(Rocky Mountain Institute) 的學者們，就曾提出這樣的深入見解：我們不是因為海洋裡漁船的數量不夠，或製造漁船的技術不夠進步，而限制了經濟的發展；而是因為海中魚群數量的大量減少。我們不是因為馬達的功率下降，也不是因為製造機器的技術不好，而限制了經濟的發展；而是因為地下水已經漸漸耗盡。我們不是因為電鋸的數量不足，也不是因為製造電鋸的技術退步了，而限制了經濟的發展；而是因為原始森林的大量消失。(註6)換而言之，現代社會的擴張模式，已經面臨到這些真正的「生物性限制」。這也是我們未來生存下去的限制因素。因此，經濟學家赫曼·戴利 (Herman Daly) 才認為，人類正面臨歷史性的關鍵：『限制人類繼續繁榮的，不是人造資本的匱乏，而是地球的「綠色資本」之匱乏，而這是自古至今首次發生的現象。』(註7)

三、 綠色發展 (Green Development) 概念

面對現代社會的發展模式，以及人類即將見到的生態浩劫，知識界也開始有不同的聲音了。早在 1970 年代末，就有生態社會學家(eco-socialist) 對現代社會提出過深刻的批判與反省。例如，學者 Roszak (1979) 曾論道：只要西方社會仍然以「自許正統的都市化 / 工業化」之視野，來掌握「人類的終極目的」，則人類社會就無法真正擁有富裕與正義。因為，現代社會所帶來的「不均衡發展」，使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及地區長期處於貧窮狀況，而其「大欺小」的剝削機制，也造成社會階級上的不平等。而這個狀況，絕不會被少數富裕的國家或個別受惠的社會階級所改變。(註8)另外，學者 Bookchin (1979) 也論述道：現代社會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的問題，是無法用治標的方式，而獲得解決的。它一定要經過政治性的改變，才可能將目前的現代發展模式「推翻」；因為，目前「生態系統的錯置與錯位問題，在既有社會功能體系之中，是不可能得到解決的。」(註9)

一些學者如 Friberg 及 Hettne (1985) 等人，則是更清楚的提出一個

「綠色發展」的新典範 (green development paradigm)。這是一個較有遠見，且深具啟發性的一種社會發展理念，非常值得我們認真的理解。經過初步研究之後，我們發現：首先，「綠色發展」清楚地反對「現代化發展」與「現代思維模式」。尤其，它反對「現代價值觀」之持續機構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與體制化。譬如，建構起現代社會的各種「官僚層級化、工業化、都市化、資本市場化、科技化」等等社會機制，都應受到重新的檢驗與質疑。Friberg 及 Hettne (1985) 認為，「綠色發展」的理念，代表一種對「現代發展計畫」的「綠色挑戰」。也就是，它是對「現代發展模式」所基本遵循著的「進化論原則」(包括「掌控、擴張、成長、效率」等弱肉強食的生存原則) 的一種正面挑戰。(註 10)

基本上，「綠色發展」所強調的是一種「減現代」(de-modernization) 的發展模式。其主要策略是：期待人類社會，能夠逐漸由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之中，撤退出來，並且慢慢形成「一種新的、非現代化的、非資本主義式的發展模式」。而這個新的發展模式，則是建立在「資本主義興起之前的社會秩序」中較為進步與前衛的元素或原則。也就是說，它引用小型傳統社會中的先進社會原則，但放棄小型傳統社會中一些遺留的剝削機制或可能違反人性的文化元素。Friberg 及 Hettne (1985) 更進一步闡述道：其實「綠色發展」，是一種深入自然與接近土地的「風土性發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它的主要原則包括四點：(a) 任何一個尋求發展的「基本社會單元」，應該是一個在文化上有清楚自我定位的社群 (community)。而其發展方向，一定是根植於其自身的價值與其文化機制的。(b) 依靠自己 (self-reliance)。每一個社群的生存與發展，都必須依靠自己的內在力量與在地資源。即不應依賴或掠奪他處的資源。(c) 社會正義。應避免有任何不平等的內部機制出現。(d) 生態平衡 (ecological balance)。任何一種發展，皆須對地方生態體系的潛能與限制，有充分的認知與自覺。(註 11)

而「綠色發展」的力量來源，根據 Friberg 及 Hettne (1985) 的說法，基本上是來自於人類社會中的三種團體。第一種團體，是「傳統主義者」。傳統主義者，他們一向崇尚傳統社會中的許多內在價值。因而一直嘗試著抗拒「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社會實踐。這些社會實踐，包括強大的國家的建構、商業化體系之建構、工業化社會的建構等等。而這些人們主要是，位居在現代主流社會之外的「非西方文明區域」與「宗教團體」、古老的王國、歷史悠久的部落、地方社群、血緣親族團體等。第二種團體，則是

在現代社會體系中「被邊緣化的族群」，他們包括工作上被剝削的人們，在勞力上及精神上被剝削的工作者，非自願性的失業者等等。還有，那些在「現代社會」這具「龐大機器」之中喪失有意義的功能之人們。第三種團體，則是「後物質主義者」(post-materialists)。後物質主義者，他們是一些年青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並且嚮往或堅持一種「非物質性的存在價值」的新興一代。他們基本上尋求一種「非中央監控」、「非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並抗拒「福特主義」(大量生產、大量製造、標準化流程) 的價值體系，也抗拒著俗媚的大眾化商業主義。(註 12)

另外，與「綠色發展」概念有相輔相成關係的一些新興理念，包括：

- (一) 深層生態學 (Deep Ecology)。深層生態學的倡導者們，將「大自然」當成具有一種精神價值的「存在」。他們堅持一種「荒野倫理」(wilderness ethics)，且用一種俱宗教情懷之態度對待大自然。這主要是來自於 Henry David Thoreau 與 Aldo Leopold 等人的文學性、哲學性之啟發，以及其深刻之精神領導。深層生態學的倡導者們強調，「現代社會」是以一種「純功能性」的方式來對待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因此，我們必須與大自然建立一種新而深刻的關係，才能挑戰這種體制上的謬誤。(註 13)
- (二) 「生物中心論」(bio-centrism)。這類論述，挑戰了現代社會習以為常之以「人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它認為，人口的增長與保存不應該是一項必然的價值。人的存在，就像大自然中任何一種生物體是一樣的，都應該受到生物性的限制與規範。當天災、飢荒、病禍來了，就是大自然對人口的自然淘汰與限制。並不需為了人類自身的存在需求，而違反大自然的規律，甚至破壞其他生物體的生存空間。尤其，更不應該為了人類的貪婪、物質享樂、任意消費、縱欲等等因素，而違反大自然的規律，甚至破壞其他生物體的生存空間。這種思維方式，當然是挑戰了人類社會在「現代發展模式」方面的道德性與正當性。(註 14)
- (三) 向「原生住民」(indigenous people) 的在地智慧學習。學者 Sessions (1985) 認為「從有歷史的時候開始，人類社會就出現過許多類型的文化與人們，對他們所居處的土地及環境景觀，都曾發展出一種深層直覺性的或俱神秘感受的詮釋方式」。而這樣的詮釋方式，卻形成了他們與其土地一種恆常久遠的和諧關係，並且都能夠塑造出一種強烈與深刻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註 15) 學者 Katz 及 Kirby 則強調，要深入研究「美洲原住民 (印地安人) 生活世界的建構」，

因為那是一種值得學習的生活系統，其中竟然不存在人與大自然之間的基本二分法，也不存在有機生命體（如動植物）與無生命物質（山巒、土石、流水）之間的基本二分法。而向各地「原生住民」智慧再學習，才能達到我們現代人一種深層文化意識的轉型。（註 16）

以上所述，是對「綠色發展」理念的基本介紹。我們發覺，「綠色發展」確實是深具啟發性的一種社會發展理念。當「現代化發展」，已經成了「狀況百出」的一種發展模式時，「綠色發展」其實正是我們人類社會的新希望。我們也可以發覺：在這「綠色發展」概念的架構之下，原本承載著東方古老學問傳統的「堪輿學」或「風水」，也有新而深刻的意義了。「風水」，正是代表了古代人嘗試去掌握自然界中「深層生態秩序」的努力。尤其，它嚮往著一種與大自然秩序達到完全和諧的一種人類發展，這種基本態度與其哲學前提，正是我們現代社會特別需要的一種「綠色發展」概念。對此意義，在此謹初步陳述三點，作為本文之結論：

- (一)「風水」，有非常深刻的「生態系統」概念。風水，正如「原生住民」（indigenous people）的在地智慧一樣：「風水」的認知方式裡，不存在著人與大自然之間的基本二分法，也不存在著有機生命體（如動植物）與無生命物質（山巒、土石、流水）之間的基本二分法。譬如，「風水」的學理，將大地山河與其中生物存有狀態，視作為一個整體的「生命氣脈系統」。因此，它強調著「擇居選址」的重要，深信人們的生命起伏與大自然之間的起伏，存在著一種深層的互動關係，互相影響、互相感應。而風水的基本觀念，也將無生命物質（山巒、土石、流水）視作有機生命體的一種存在。如將山巒的走勢，稱為「龍」的行走。將河川流水的朝背，稱為有情或無情等等。確實，風水法則的實踐，對人們所居處的土地及環境景觀，將會發展出一種深層本能感受的「詮釋方式」。而這樣的詮釋方式，也將形成了人們與其土地一種恆常久遠的和諧關係。值得我們現代人的再度學習。
- (二)「風水」的實踐，其實是符合現代社會需要的一種「綠色發展」乃是具有新的社會實踐意義。廣義「風水」概念下的環境開發觀念，或是其社會發展觀念，其實就是一種深入自然與接近土地的「風土性發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法則。它符合著「綠色發展」的基本原則：它的學理概念，是來自一個在文化上有清楚自我定位的社群（community），並根植於其自身的價值與哲學傳統。它嘗試深入掌握所居住之大地的內在力量與在地資源，並不依賴或掠奪他處的資源。

它具備生態平衡 (ecological balance) 的觀念，對地方生態體系的潛能與限制，能有充分的掌握與認知。因此，對風水的研究與推展，應可以彌補「現代發展模式」的不足。而它以「大地生 > 命能量」為中心的「發展模式」，甚至可以進一步修補大地秩序、拯救自然界的「生命系統」。

- (三)「風水」，可立即作為「綠色發展」的公共環境開發原則。現代社會對環境開發的方法，即所謂的「現代開發模式」，現在確已到了有些「捉襟見肘」的地步了。我國幾個主要的公共工程，都產生不少預期之外的重大「生態反撲」狀況。我們應該可以開始正視這個問題了，以免繼續破壞台灣珍貴的土地資源。平實而論，「現代開發模式」有其優點也有其缺點，它考慮了人口問題、經濟發展問題、交通便利問題，但獨獨缺少考慮自然界的「生態秩序」問題。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截長補短」，重新整合出一個更優良的「環境開發模式」。那些隱藏在自然界之中某種深層的「生態秩序」，既然是現代知識系統、現代工程師、學者、專家們所不了解的。這時，就應該不避諱的採用「風水」的基本學理及定位選址技術，來幫助我們了解與掌握某種「深層生態秩序」(即大自然中山川水文的基本走向、運作方式與規律)。換而言之，「風水」其實可立即作為「綠色發展」的公共環境開發原則之一。這完全只是觀念上的一種開放與接納而已。如果，「風水」真能與「現代開發模式」聯手合作，應是一種兩全其美之辦法，或能達到相輔相成的最佳結果。

註釋

註 1：引自保羅·霍肯、艾默立與杭特·羅文斯(Paul Hawken, Amory and L. Hunter Lovins) 著，吳信如譯，2002，《綠色資本主義》，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p214。

註 2：資料來自《六輕計畫與經濟發展——一項奠基台灣跨足世界的國土擴張計畫》，麥寮台塑工業園區印行，2005。

註 3：引自保羅·霍肯、艾默立與杭特·羅文斯(Paul Hawken, Amory and L. Hunter Lovins) 著，《綠色資本主義》，2002，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p31。

註 4：同上， p26。

- 註 5 : 同上 , pp214-215。
- 註 6 : 同上 , p26。
- 註 7 : 同上 , p216。
- 註 8 : “*Green Development Theory ? Environmental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J. Crush (ed.), *Power of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1995), 94.
- 註 9 : 同上。
- 註 10 : Friberg, M. and Hettne, B. (1985), “*The Greening of the World: towards a Non-deterministic Model of Global Processes*,” in H. Addo et al.(eds.) *Development 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Global Problematique*, (Sevenoaks: Hodder and Stoughton, 1985), 75.
- 註 11 : 同上。
- 註 12 : 同上。
- 註 13 : Graber, L. *Wilderness as Sacred Space*,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6) .
- 註 14 : Amin, S., *Maldevelopment: Anatomy of a Global Failure*, (London: Zed Books, 1990).
- 註 15 : Sessions, G. “*Western Process metaphysics*” in B. Devall and G. Sessions (eds.) *Deep Ecology: Living as if Nature Mattered* (Salt Lake City: Gibbs Smith Publisher, 1985).
- 註 16 : Katz, C. and Kirby, A.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the Environment in Everyday Life*,” in *Transactions of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6: 259-271.

參考文獻

1. Susan Schech 和 Jane Haggis 著 , 沈台訓譯 , 2003 , 《文化與發展: 批判性導論》, 巨流出版社。
2. 保羅 . 霍肯、艾默立與杭特 . 羅文斯(Paul Hawken, Amory and L. Hunter Lovins) 著 , 吳信如譯 , 2002 《綠色資本主義》,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3. Porter, Allen and Thompson ,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1990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J. Rigg, *Southeast Asia, in The Human Landscape of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5. D. Miller, *Worlds Apart: Modernity through the Prism of the Local*. (London: Routledge).
6. J. Crush (ed.), *Power of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7. B. Devall and G. Sessions (eds.) *Deep Ecology: Living as if Nature Mattered* (Salt Lake City: Gibbs Smith Publisher, 1985).
8. Amin, S., *Maldevelopment: Anatomy of a Global Failure*, (London: Zed

- Books, 1990)
9. Graber, L. *Wilderness as Sacred Space*,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6).
 10. H. Addo et al.(eds.) *Development 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Global Problematique*, (Sevenoaks: Hoder and Stoughton, 1985).